

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主体-制度-技术-产业的实践框架

粟娟, 李威龙, 覃雯

(吉首大学旅游与城市规划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要: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 选取71份典型乡村治理案例为研究基础, 提炼出乡村治理有效的“主体-制度-技术-产业”实践框架。研究发现: 基层组织通过激发主体活力、建立健全制度、引入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发展等措施能够显著激发乡村治理效能, 并正向驱动乡村振兴建设。而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实现, 会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对乡村实现治理有效形成“反向形塑”的过程。在乡村治理实践中, 多元治理主体间“上下协同”和不同制度形式间的“协同互补”作为内部驱动力量, 有效地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而人才与技术的“供需适配”以及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内外兼举”作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外部驱动力量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的实现。

关键词: 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 典型治理; 实践框架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5)15-0326-06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治理, 难点也在治理^[1]。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又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2]。新时代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对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探索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实践路径、考察乡村治理的新形态, 已成为当前基层实践的重要议题。中国式乡村治理必然显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3], 其并非是既定模式的简单复刻, 而是在深刻实践逻辑与创新特色中逐步构建, 体现了因地制宜与动态优化的鲜明特征^[2]。因此, 考察不同地区乡村治理成功实践为总结可推广治理经验、纾解乡村治理之困以及回答乡村治理绩效如何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于厘清乡村如何实现治理有效并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典型治理机制的核心功能在于示范引领和政策扩散。受决策能力限制和“经济”理性思维影响, 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会随治理格局与利益关系变化调整策略和施政重点^[4]。由此不断涌现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均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及内在逻辑^[1], 是洞察和阐释治理实践的重要素材^[5]。因此, 考察不同地区有效治理案例对于总结有效治理经验、挖

掘深层治理逻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典型治理案例研究, 通过考察2022年至今全国71份典型治理案例, 剖析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规律与实践路径, 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1 文献综述

探究乡村治理何以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核心命题, 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向基层延伸的关键议题。既有研究已从多视角、多领域对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方面进行了探索。在乡村数字化治理方面, 陈华平和张廷丹^[6]提出“主体-方式-效果”的三维治理逻辑, 指出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智慧化和治理成果的共享化是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的核心方式。在乡村文化治理方面, 陈勇军和郭彩琴^[7]认为国家逻辑应以保护乡村文化的多样性、维持文化治理的协同性和尊重农民文化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 丁国峰和蒋森^[8]提出需要重构以权力为中心的环境法制体系, 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 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可见, 针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现存的各种难题, 诸多学者进行了乡村治理绩

收稿日期: 2025-02-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261042); 吉首大学研究生项目(JDY2024051, JDY23219)

作者简介: 粟娟(1973—), 女, 湖南芷江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旅游管理; 李威龙(2004—), 男, 湖南邵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旅游管理; 通信作者覃雯(1980—), 女, 湖南张家界人, 博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旅游管理。

效提升的可行路径探索。现阶段,以党建引领带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3]、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9]、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共同体建设^[10]、以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充分释放治理效能^[11]是实现乡村“善治”有效方案。但既有研究多采用单一要素解释框架,如主体能力决定论或技术赋能论,难以解释复杂治理情境中多要素的协同机理。

深刻剖析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框架,既需要通过理论验证揭示其内在逻辑,也需要从各个维度考察乡村治理“何以可能”的运行机制。已有研究通过对治理试点、政策变革及多元主体协同的实证剖析,为理解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12-13]。然而,从政策方法论角度审视,以全国范围内典型案例为样本,对中国乡村治理实践及其深层逻辑进行系统辨识、阐释和佐证,仍是一个未尽议题^[14]。第一,现有文献虽然揭示了乡村治理试点的一般性特征^[1,7],但对当前实践中各主体之间互动协调、制度创新与技术产业支持作用的内在联系缺乏系统性梳理。特别是在顶层设计与基层自主探索不断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治理试点的战略思路、核心任务与终极目标,尚未形成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框架。第二,任何治理实践均根植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而全国典型案例的分析能够为揭示不同模式下的治理效能提供独特视角^[4-5]。通过对不同区域和样本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试验方法论在实际运作中的优势与局限,从而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果提供科学依据和经验启示。因此,本文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尝试厘清以乡村治理有效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以期对未来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以归纳分析为核心,通过对多样化资料的系统处理,构建理论并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15]。访谈记录、文本材料等经验性数据常作为研究依据,通过提炼编码与不断比较,可形成概念和类属,从而搭建具有学理深度的中层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结合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全国典型治理案例的政策文本。原因有二:一方面,乡村治理实践逻辑的探讨依赖大量典型案例,而这些政策文本反映了

各地官方认可的治理经验,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因此得出的结论更具普适性与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研究结论基于对治理方式和逻辑的理解与总结,而扎根理论正是通过系统解读实践资料并构建理论模型,方法与研究目标高度契合。

2.2 资料来源

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路径,本文聚焦于全国各地典型治理案例的政策文本。通过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搜索“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关键词,收集了2022年以来的相关政策文本共88份。根据研究主题与内容要求,剔除了17份与乡村治理无关的文本,剩余有效政策文本71份。选择2022—2024年的治理案例,主要是基于研究实际的需要:一方面,能够呼应党在二十大提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行路径参考;另一方面,研究近两年内的典型治理案例,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更好地契合当下乡村治理的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及可推广性。针对所搜集的政策文本,通过手动筛选的方式,对典型治理案例的政策文本中涉及乡村治理实践的治理模式、治理路径等的相关内容进行截取,最终得到原始文本资料15万字。

3 资料编码及模型构建

3.1 开放式编码及初始范畴

扎根理论的关键环节是对搜集的资料进行编码转译,找出核心概念范畴,用于理论构建和体系研究^[16]。本文立足原始文本资料,对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的71份典型治理案例文本进行内容抽取、范畴提炼,最后形成用于乡村治理有效实践路径研究的主范畴。其具体操作方式为: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随机抽取60份政策文本进行序列编码,并根据文本的核心内容提取关键词并进行二次编码,如“8-1”表示第8份文本的第1个初始概念,得到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自治机制创新、返乡人才引导机制等63个初始概念;其次,对提取的初始概念进行重复性方面的筛选、剔除,得到8个初始范畴(表1)。

3.2 轴编码

在主轴编码过程中,通过反复对比,逐步理清各个类别之间的联系。最终,将17个初始范畴根据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主要驱动力,归纳为主体驱动、制度驱动、技术驱动和产业驱动4大类。表2展示了这4大类与副范畴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及其内涵。

3.3 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通过系统地将各个范畴和

表 1 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文本的开放式编码

编号	初始范畴	代表性原始资料
1	基层党组织引领	31-1 创新“融合党建”模式,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优势,初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2	村民自治机制创新	37-6 按照村民自治章程制定村规民约,规范村民日常行为,全面实施重大事项民主表决
3	乡村志愿者服务体系	18-3 创新开展“4 小时服务”模式,确保安置区服务不断档
4	基层治理协同效能	64-4 通过持续推进、多跨协同、迭代升级,统一标准、互通数据、规范建设,建成“1+10+N”集成平台,逐步实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村钉”
5	返乡人才引导机制	35-3 通过融资、用地、税收等政策礼包,让返乡创业人员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又要加快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
6	积分制与清单化管理	9-11 新“考题”开列负面清单,设置细化指标,出现哪条逐项扣分
7	法治保障与合法性嵌入	9-7 不断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国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8	乡规民约动态调整	4-5 将“礼之用,和为贵”等传统美德融入村规民约,创新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
9	村级事务透明化机制	66-2 开发视频直播、在线投票、自动计票、生成纪要等功能场景,推动决策过程公开透明,确保公平公正
10	制度化的民主议事程序	32-3 民主议事由“做群众工作”向“由群众做工作”转变,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论证、协商,求得最大公约数
11	……	……

表 2 乡村治理现代化典型治理文本的主轴式编码分析及内涵界定

主范畴	副范畴	具体内涵
主体驱动	基层领导组织统筹	基层领导组织通过规划治理方向、整合资源和协调行动,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与规范性
	村民集体参与	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协商议事等方式,推动村民全面参与基层治理
制度驱动	正式制度规制	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乡村公共事务提供权威的行为约束与实施框架
	乡规民约调和	结合乡土文化与传统习俗,通过柔性规则实现村庄秩序的协调与和谐
技术驱动	先进人才革新	利用先进人才在技术应用、组织管理和实践创新中的作用,解决复杂治理问题
	高新技术优化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提升治理科学性与效率
产业驱动	集体经济盘活	通过土地整合、产业升级和收益共享,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
	社会资本联结	通过合作网络和外部投资,加强乡村与外界的资源共享与利益融合

概念以连贯的“故事线”方式整合,从而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核心范畴,并构建起理论模型^[17]。在本文中,通过将主要范畴与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情境相结合,进行深度提炼和验证,进一步明确了各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机制,从而提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乡村治理有效性框架。具体来说,在乡村治理有效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基层领导组织和村民集体作为基层治理的不同主体,构成了主体驱动力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乡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不同约束条件,构成了制度驱动力量;人才与技术作为乡村发展“软实力”,构成了技术驱动力量;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构成了产业驱动力量。4 种驱动力量的多元嵌入、相互联结,构成了乡村通过治理有效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框架(图 1)。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模型初步构建完成后,将除前述 60 份乡村典型示范政策文本外的 11 份文本导入 Nvivo 11 软件,进行第 2 轮编码分析与概念提炼。分析结果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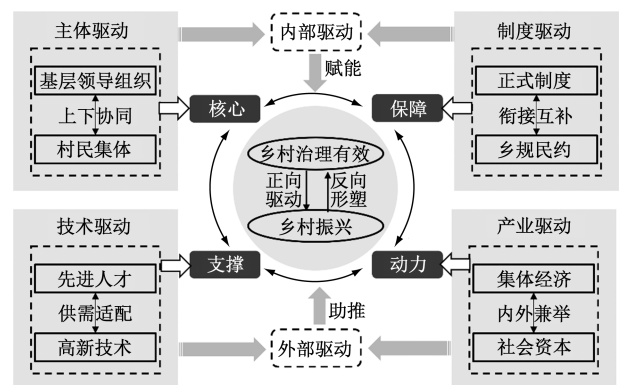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治理“主体-制度-技术-产业”的实践框架

明,没有新概念或范畴的出现,且编码过程未对已有概念的关联性产生任何变化。这表明,经过对异质化案例和样本的检验,理论模型已达到饱和状态,并通过了理论饱和度的检验。

4 乡村治理“主体-制度-技术-产业”的实践框架阐释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治理有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18]。确保治理有效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19],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环节^[20]。在乡村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基层组织通过激发主体活力、建立健全制度、引入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发展等措施,正向驱动了乡村振兴建设。另一方面,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出于治理主体、内容和方式的差异,不同地方的乡村治理模式呈现出不同特征^[21],因此在实践情景中,各基层治理组织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创新治理模式,探索出适应当地社会基础的乡村治理路径。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实现,会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对地方实现乡村治理的方式提出不同要求,即一个“反向形塑”的过程。

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是整合多元治理主体^[22],而完善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有效进行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20],二者作为乡村治理的内部力量有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保障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23],而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与基础要求^[3],二者作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过程中的外部驱动力量能够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的实现。基于前述,本文将探索主体、制度、技术和产业4种驱动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进而刻画、验证与阐释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机理。

4.1 基层组织与村民集体“上下协同”

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基层治理组织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引导,充分发挥统合功能,以高位势向下贯通治理目标和任务^[5]。基层领导组织对村民集体自上而下的管理领导起着引领、协调、支持和监督的作用,通过这种领导方式,基层领导组织能够有效组织协调村民集体,推动乡村事务的有序开展。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村民集体在推动乡村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中,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核心主体^[24]。因此,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又要充分发挥村民集体的主体作用,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由此可见,在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强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25]。基层领导组织与村民集体上下协同合作,可以促进村民自治和民主决策的实现,使村民能够更广泛地参与乡村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具体表现在村民可以更直接地参与到村庄事务的决策过程中。这种参与可以通过村民代

表大会、村民自治委员会等形式进行。在这样的机制下,村民可以就重要事务进行讨论和表决,包括土地使用、项目投资、公共设施建设等。这种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确保村民的意见被充分听取,有助于形成更加符合村民利益和意愿的决策,增强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和民主性。上下协同治理也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的高效化,建立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和水平,促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通过村民参与治理,可以更快地获取信息和反馈,更好地了解村民的需求和意见,从而更准确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此外,村民的参与也可以增加基层治理的执行力,因为村民更有可能自觉遵守并支持他们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和规定,从而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执行力。

4.2 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衔接互补”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是指通过自觉识别并加以规范的强制性规则,而非正式制度则是基于习惯和共识形成的非书面规定^[26]。在乡村治理情景中,非正式制度最终内化为人们自觉认同的乡规民约。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离不开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的有效衔接。正式制度在下沉到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中有时会与乡土观念冲突,而落后于时代的乡规民约可能也会成为乡村发展的阻滞因素^[26-27]。因此,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中,需妥善处理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之间的关系,在正式制度“下沉”与乡规民约“上浮”的互动演化过程中实现博弈的均衡。

为实现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的“协同互补”,必须推进治理制度的“软硬互构”。一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乡规民约应被纳入正式制度的框架,转化为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从而增强正式制度的民意基础和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正式制度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必须内化为集体的道德认同,并通过构建基层民众的意识形态框架,逐步摒弃陈旧的礼法陋习。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融合与共赢的过程。正式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从基层治理实践中汲取潜在的治理元素,拓展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应用路径。为实现正式制度的有效落地,必须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降低其推行的阻力。同时,正式制度也应通过普适原则,对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改造,突破其封闭性和落后性,以更好地契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4.3 先进人才与高新技术“供需适配”

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可以为乡村治理

带来新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和现代化^[28-29]。这些人才可以通过研究和实践,提出适合当地的治理方案,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乡村社区建设和规划,促进乡村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从而推动乡村治理有效。这些人才还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乡村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推动乡村治理的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因此,人才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才与技术的引进对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农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管理和营销等领域的专业人才的引入,可以优化农村企业的管理结构,拓宽市场空间,推动产业的良性发展。此外,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激发电商、农业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助力农村经济朝着多元化与高效化的方向演进^[30]。因此,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不仅提升了农村经济的竞争力,还为其高效、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4 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内外兼举”

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在乡村发展中通常发挥着互补的作用^[31]。集体经济在乡村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基础,通过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经济组织,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社会资本则通过个人或企业的投资、创业和经营活动,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两者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在乡村发展中,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都希望通过投资和经营活动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也关注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32]。因此,双方在共同推动乡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在乡村经济中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内外兼举”,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集体经济在土地、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优势,而社会资本则在技术、资金、市场开拓等方面有其独特贡献,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乡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发展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集体经济通常在传统农业、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和基础,而社会资本则在现

代农业、农业科技、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方面有着更多的创新和投入。通过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治理有效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向度,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而乡村振兴总目标的实现,会出于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对地方实现乡村治理形成“反向形塑”的效应。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整合多元治理主体,而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有效进行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这两者作为乡村治理的内部力量,有效地赋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动力。技术创新是保障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而产业兴旺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与基础要求,这两者作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过程中的外部驱动力量,能够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具体来说,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基层治理组织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引导,充分发挥统合功能,又要充分发挥村民集体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基层治理组织与村民集体的“上下协同”。在乡村治理制度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协调和优化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正式制度“下沉”与乡规民约“上浮”的互动演化过程中实现博弈的均衡,最终实现正式制度与村规民约的“协同互补”。人才与技术的“供需适配”可以为乡村治理有效带来新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和现代化,还可以带动农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推动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是助推实现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在乡村发展中通常发挥着互补的作用,集体经济与社会资本“内外兼举”可以促进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许源源,王璉.典型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2003—2022年的乡村典型示范政策的扎根探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96-109.
- [2] 何得桂.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23(5):54-61.
- [3] 朱新武,王智堃.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云南社会科学,2023(5):19-29.
- [4] 彭小兵,彭洋.乡村振兴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治理逻辑研究:基于41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9):80-88.
- [5] 单菲菲,高敏娟.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基于“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扎根理论研究

- 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3, 24(4): 29-40.
- [6] 陈华平, 张廷丹. “主体-方式-效果”: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三维”逻辑[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3(5): 75-80.
- [7] 陈勇军, 郭彩琴.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 逻辑、路径及其限度[J]. 学术探索, 2023(2): 111-118.
- [8] 丁国峰, 蒋森.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J]. 行政论坛, 2022, 29(6): 118-126.
- [9] 孙健, 何紫菱.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5): 12-20.
- [10] 杨长福, 金帅.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2): 168-177.
- [11] 杨志玲, 周露. 中国数字乡村治理的制度设计、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 经济与管理, 2023, 37(5): 16-23.
- [12] 李宁.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治理长效机制[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14): 62-66.
- [13] 邹然. 社会智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功能、困境和进路[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12): 136-142.
- [14] 陈荣卓, 金静. 中国乡村治理试验的双轨逻辑及链接机理: 2019—2024年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经验证据[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8): 93-108.
- [15]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9(4): 58-63, 73.
- [16] 陈微波, 王凯旋, 王斐霖.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工作风险识别体系的构建: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财经论丛, 2019(11): 80-90.
- [17] 孙晋坤, 黄潇婷, 章锦河, 等. 旅游疲劳的发生机制、多维特征与应对策略: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12): 130-139.
- [18] 郭占锋, 李铁星, 张森, 等.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 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1): 68-84.
- [19] 汪义力, 陈文胜.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涵、价值遵循与实践样态[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 1-9.
- [20] 袁莉.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及实施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11): 113-121, 185-186.
- [21] 吕德文. 乡村治理 70 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4): 11-19, 156.
- [22] 袁明宝. 行政激活社会: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J]. 求实, 2023(6): 79-91, 109-110.
- [23] 谢婷婷, 冯梅菊. 绿色金融赋能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兼论农业生态效率的中介效应[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1): 1-5.
- [24] 陈永典, 于丽娜.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 以大别山地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 1-6.
- [25] 何得桂, 绳家明. 乡村振兴进程中组织振兴的有效实现方式研究[J]. 农村经济, 2023(11): 54-63.
- [26] 冯麒麟.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正式制度与乡规民约: 一种制度分析[J]. 中州学刊, 2023(3): 74-81.
- [27] 张爱军, 张媛. 迈向善治: 制度与乡规民约的契合逻辑与建构理路[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7.
- [28] 邱春林.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思考[J]. 理论学刊, 2024(3): 133-141.
- [29] 朱战辉.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6): 126-136.
- [30] 刘儒, 郭提超, 辛建岐. 新型数字基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 财经科学, 2024(11): 57-71.
- [31] 向楠. 集体经济与乡村有效治理研究的进路与展望[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1): 1-8.
- [32] 涂颖洁.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对乡村连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4, 44(8): 191-200.

What Makes Rural Governance Effective: 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Subject-Institution-Technology-Industry

SU Juan, LI Weilong, QIN Wen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427000, Hun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rootedness theory, 71 typical cases of rural governa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basis, and the “subject-institution-technology-industry” practice framework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was extracted. It is found tha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ve positively driv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main body, establishing a sound system,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will form the process of “reverse shaping” for 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n localities.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top-down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complementary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forms serve as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effectively empow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talent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social capital, as effective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rural governance, have strongly contribu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typical governance; practical framework